

古今小说传承溯探

刘中珉 著



岳麓书社

古今小说传承溯探

刘中珉 著

岳麓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今小说传承溯探/刘中项著,——长沙:岳麓书社,2001

ISBN7-80665-088-1

I. 古… II. 刘… III. 文学研究-中国-近代

IV. I207.4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29935 号

责任编辑:徐耕白

封面设计:谷利民

古今小说传承溯探

刘中项 著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长沙市河西新民路 10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吉首大学科教印刷厂印刷

2001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625

字数:320000 印数:1-1000

ISBN7-80665-088-1

I·524 定价:22.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厂址:湖南吉首大学 邮编 416000

目 录

引 论	(1)
第一章 古今小说理论传承	(13)
小说性质论	(16)
一、对“小说”性质认识的历史追寻	(16)
二、现当代对古代小说性质理论的继承	(21)
三、小说性质应当如何确定	(25)
小说通俗论	(32)
一、小说通俗化理论产生的历史原因	(32)
二、“通俗”理论指导下的古今实践	(38)
三、小说通俗化理论在新时代的发展	(41)
小说人物论	(48)
一、高度重视人物塑造的理论传统	(48)
二、人物个性化理论的代承与发展	(51)
三、人物“缺陷美”理论的继承及新变	(55)

四、人物性格丰富性理论的发扬光大	(58)
小说语言论	(62)
一、特别重视语言艺术的中国文学传统	(62)
二、古今小说语言理论传承的具体表现	(65)
三、现当代小说语言艺术理论的新发展	(71)
作家修养论	(77)
一、重视小说家思想道德修养的传统	(77)
二、小说家生活修养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80)
三、小说家文学修养理论的古今传承	(84)
四、小说语言修养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87)
第二章 古今小说创作题材传承	(94)
传奇题材小说	(97)
一、古今不舍的“传奇”创作追求	(97)
二、传奇的现实主义风采和浪漫主义魅力	(101)
三、现当代传奇小说的新发展	(108)
历史题材小说	(114)
一、中国“重史”的优良传统	(114)
二、初说古今历史小说的“基因”遗传	(119)

目 录

三、再说古今历史小说的“基因”遗传	(125)
四、历史小说的“基因”遗传及“病变”	(131)
家庭题材小说	(138)
一、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	(138)
二、家庭文化的正负价值	(141)
三、文学传统的重要作用	(145)
言情题材小说	(152)
一、生活中最能牵动人心的故事	(152)
二、历代言情文学的深刻影响	(156)
三、古今言情小说传承的诸种表现	(160)
四、新言情小说的显著发展	(165)
讽刺题材小说	(172)
一、古今讽刺题材小说代承之因缘	(172)
二、古今讽刺小说艺术代承之表现	(178)
三、现当代讽刺小说思想艺术方面之新变	(182)
第三章 古今小说创作艺术传承	(188)
古今小说结构艺术	(191)
一、古代小说结构的基本类型	(191)

二、古今小说结构传承的具体表现	(195)
三、现当代小说结构艺术的新发展	(201)
古今小说情节艺术	(207)
一、“巧合之妙”的古今传承	(207)
二、“曲折之美”的古今传承	(212)
三、“团圆之趣”的古今传承	(217)
古今小说叙事艺术	(225)
一、我国叙事艺术的民族特征	(225)
二、古今小说叙事视角的传承及表现	(229)
三、现当代小说叙事艺术的崭新进步	(235)
古今小说描写艺术	(240)
一、古今小说描写要求方面的传承	(240)
二、古今小说描写方法的传承	(247)
三、现当代小说描写艺术的新发展	(255)
古今小说意境艺术	(264)
一、“意境”说对小说创作的重要影响	(264)
二、古今小说创作中“意境”艺术的传承	(268)
三、新小说中意境追求的新高度	(274)

第四章 古今小说传承之个性风采	(280)
茅盾对古代小说传统的继承	(282)
一、题材内容方面的继承与发展	(282)
二、结构艺术的继承和发展	(288)
三、表现艺术的继承与超越	(294)
郭沫若对古代小说传统的继承	(300)
一、古典浪漫主义小说传统的发扬	(300)
二、抒情传统的创造性继承	(304)
三、“发愤”精神的继承光大	(308)
四、史传因素的继承与发展	(311)
张恨水的小说创作与古代章回小说之传统	(315)
一、文学修养决定了他对传统的继承	(315)
二、通俗性的继承与发展	(319)
三、张恨水在现代小说史上的地位	(323)
周立波的小说创作与古代小说传统的影响	(329)
一、小说结构和情节艺术精华的吸取	(329)
二、人物刻画艺术的精采运用	(334)
三、地域和民俗特色描写的重视	(341)

赵树理的小说创作对古代平话艺术的学习与继承	(348)
一、平话艺术的深刻启示与影响	(348)
二、对平话结构艺术的学习采用	(351)
三、对平话表现艺术的聪明吸收	(355)
刘绍棠小说的艺术特色与古典小说的影响	(361)
一、乡土地域性传统继承的必然性	(361)
二、小说通俗性传统的继承	(367)
三、曲折性传奇性传统的继承	(371)
四、古代田园诗画意境情调的继承	(373)
谌容对古典小说与外国小说艺术的吸纳	(380)
一、对古代小说题材继承的个性表现	(380)
二、结构艺术的继承与新变	(385)
三、表现艺术的继承与发展	(389)
结 论	(395)
后 记	(401)

引 论

在我国文学的诸种品类中,小说是较迟成熟的一种,但是它却后来居上,成为我国文学中发展最快,也影响最大的一种。我国古代小说发展到明清时代,它虽然没有能够被封建统治者视为文学的正宗,却在民间和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的客观影响不能不使封建文人也承认它与秦之文、汉之赋、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并列而作为“一代之文学”^①。明清时代随着《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优秀小说的出现,以及大量才子佳人小说,鬼神魔怪小说,官场黑幕小说,社会谴责小说等的大盛其时,小说成为了社会上影响最大的文学品类。梁启超十分重视小说的社会作用。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说:“欲望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② 清末地主阶级改良派的维新运动失败后,小说更成为维新派人物企以影响社会的最重要的文学样式。乘着改良主义的时代思潮,小说的地位空前提高,以致出现了“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如小说何”^③ 的盛况。但是,任何事物都会有它的萌芽、发展、勃兴、顶点,也就当然会有它的消落,中国的古典小说也是如此。小说在经历漫长的

①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六艺书局发行,第1页。

② 《新小说》,1902年第1期。

③ 康有为:《闻菽园居士欲为政变说部诗以速之》,《南海先生诗集》(卷五)。

发展过程,到明清时代趋向成熟之后,以上述诸多长篇小说的出现为标志,形成了古典小说发展的高峰;而那些高峰集合起来的山群,成为了后来的古典小说家只能仰视咨嗟,却无法超越的高度。这样,古典小说的发展也就从它的高峰开始转而向下延伸了。这当然是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使然。而且就在这样的时期,中国社会在政治与经济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帝国主义的入侵,中断了中国封建社会垂而不死的延续。西洋人带着洋枪大炮、鸦片、货物和他们的文化涌入了中国。随着割地赔款,建立租界,开放口岸,中国迅速地半殖民地化。殖民文化在侵袭与征服中国本土文化的过程中,在对殖民地造成破坏与加强奴化的压迫中,它也会客观地推进半殖民地的现代化进程。半殖民地化一方面使中国陷入了帝、官、封三座大山压迫的深渊,另一方面也激起了中国人民空前的爱国主义热情,掀起了更加汹涌的革命浪潮。社会生活的巨变,也必然地促使反映它的文学发生大变。文言小说,单一的章回体小说,以及其它的文言文学对于反映现代生活,已经有了许多严重的不适。因此新诗歌,新散文,新小说和其它的新文体,在时代的潮流中应运而生。这是社会时代的变化促使文学必须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原因就是刘勰早就指出过的“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① 这是就变的一方面来看,变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不变只能被时代所淘汰。然而问题还有另一方面,任何事物的变化,都必然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同时既有表层变化与深层变化的区分,还有人们主观上要求速变,而事物客观上只能缓变的快慢矛盾。我们说中国古代文学到现当代文学的变化过程,也是这样一个多种矛盾相斗争,多种因素起作用的极为复杂的运动过程。

① [梁]刘勰:《文心雕龙·时序》,郭绍虞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92页。

在社会生活时代潮流的推动下,中国文学的变化,由古代文学发展到现当代文学,在文学形式上的确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诗歌由“豆腐块”的律、绝,变为新时代的自由体诗歌,小说由古代的文言文体,变为了现代汉语的叙事体,在小说结构上也打破了古代长篇小说章回体的唯一形式,变为了多种现代结构方式的小说;散文也由古代文言变为了用现代汉语写作;戏剧由过去以京剧,各种地方剧为代表的戏曲一统天下,变为了新话剧、新歌剧、新舞剧大行于世,并在城市中有成为主流的趋势。“五四”时代的文学革命,与过去历史上任何封建时代的文学革新运动,或者“质文代变”的变化都有着本质的不同。这种不同在于:过去一个朝代或时代的文学变革,或是文学作品所反映的内容有了变化,或者是某种文体,如古代的散文、赋、骈文、诗、词等文体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成为文坛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文体。但是,古代文学的这种代雄,一般也是社会生活与文学自身,在长期发展中缓慢演变的结果。一种文学样式的称雄,与另一种文学样式的衰落并不构成什么相克的矛盾。再则,从文学运用的语言来看,都是文言文学。“五四”新文学运动,却是一场对旧文学进行全面革新的运动。这场运动要在短时期内完成一次从内容到形式、语言的中国文学革命。这场文学革命的深度与广度,都是任何一次古代的文学“代变”或“诗文革新”所不能够比拟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完成了一次中国文学史上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使中国文学发展由古代跨入了现代。不深刻地认识这一点,就没有真正地认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伟大意义。“五四”运动对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批判是坚决而猛烈的,确实有暴风骤雨之势。这种猛烈的气势在当时既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要的。因为要在短时期内,对旧文学全面革命,并且创造新时代的文学,没有摧枯拉朽般的气势,是不可能做到的。而且我们认为,“五四”时代对旧的传统文学的批判,以辩证的观点来看,同样是对文学传统的继承。我们觉得,在对

“继承”的理解上,应该将学习与批判,甚至否定联系起来认识。不能认为只有向传统正面的学习,使其优秀的东西承续下来才叫继承传统;对传统进行深刻的批判、分析、反思,否定其中不合理的或者已经不适合于新时代的东西,当然很明显是革新和改造传统;但是,这样做的目的又是为了更好地、更科学地继承传统。我们认为对待传统与对待外国的经验,应当运用同样的方式——分析批判的方式。因为我们都知道,对外国的东西不加批判地搬用,那只叫做“全盘西化”,并不能叫学习借鉴;同样如果对传统全盘接受,那只叫做因袭传统,而不能叫继承传统。只有对传统进行认真仔细的,科学求是的分析批判,真正吸收传统中优秀的,适合于新时代发展要求的精华,坚决地彻底地否定传统中僵化的,不适合于新时代的东西,这才叫真正科学的继承传统。这就是说,对待古代的文学传统,吸取教训同吸收经验是一样的重要,也同样是继承传统。我曾在拙文《论明清才子佳人小说的成就》中表述过这样一种观点:“曹雪芹、吴敬梓等现实主义艺术大师,能够在文学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以为除了前面说过的他们善于吸取前人成功的经验外,与他们善于批判地吸取前人,特别是才子佳人小说作者的失败教训也是分不开的。这正如狄慈根说的:‘前人的错误给我们的教益不亚于他们的积极的成就给我们的教益。’”^① 所以我们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我国古代文学的分析批判,对其中封建糟粕的否定,同样是对我国古代文学传统的继承。我们从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任何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革命,都必然会对此前的文学传统有所继承,也同时有所批判和否定。没有批判和否定的“革命”或“革新”都是不存在的。

但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正像任何革命运动一样,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五四”时期对我国古代文学传统在理论上的某些否

① 载《益阳师专学报》,1992年第1期。

定,是有过火和片面之处的,还有些观点是错误的。关于这一点,我曾在拙著《古今诗歌传承溯探》的《绪论》中曾以鲁迅、郭沫若、陈独秀、胡适、朱自清等人的某些言论为例子有所论述。尽管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巨匠有过某些偏激的言论,但是,这并不能成为论定新文学与古代文学断绝联系的论据,因为事实并非如此,小说领域就更是这样。1917年元旦,胡适之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谈到当时的新文学,就认为“今之有志文学者”应当向古代的小说如《儒林外史》、《水浒》、《石头记》学习。而且,他列举了“我佛山人”(吴趼人)、“南亭亭长”(李伯元)、“洪都百炼生”(刘鹗)为例,说明他们之所以取得了比当时其他小说家更高的成就,“皆得力于《儒林外史》,《水浒》,《石头记》”。周作人在1919年初《每周评论》第五号上发表的《平民文学》中,对《红楼梦》也是充分肯定的。他说:“只有《红楼梦》要算最好,这书虽然被一班无聊文人文学坏成了《玉娇梨》派的范本,但本来仍然是好。因为他能写出中国家庭中的悲喜剧,到了现在,情形依旧不改,所以耐人研究。”钱玄同、傅斯年等人对上述的三部小说也是肯定的。《〈小说月报〉改革宣言》中还正面肯定:“中国旧有文学不仅在过去时代有相当之地位而已,即对于将来亦有几分之贡献,此则同人所敢确信者,故甚愿发表治旧文学者研究所得之见,俾得与国人相讨论。”^①但是,新文学家对古典小说的肯定也就是如此而已,而他们缺乏具体分析研究的武断否定却是很多的。上面所提到的新文学家们除了对上述三部古典小说有嘉评之外,其余基本上就一概否定了。钱玄同认为:“至于小说,非海淫海盗之作,即神怪不经之谈;否则以迂谬之见解,造前代之野史;最下者,所谓‘小姐后花园赠衣物’,‘落难公子中状元’之类,千篇一律,不胜缕指。”^②傅斯

① 1921年1月10日《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

② 钱玄同给陈独秀的信,载1917年3月1日《新青年》第3卷第1号。

年在《怎样做白话文?》中说:“我们历史上的好小说,能有几部?不过《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三部,有文学价值;其余都是要不得。”^① 凡此种种,都是有着明显偏激性的言论。虽然我们认为新文学家们的某些观点,并不能反映新小说创作与古典小说有着诸种继承关系的实际;但是又应当看到,这些过激的言论和观点,对当时的新小说未能正确地继承我国古代小说的传统是有影响的。由于当时在理论上强调学习西方文学样式来建设新文学,甚至提出要“成就一种欧化国语的文学”,“务必使我们做出的文章,和西文近似,有西文的趣味”。^② 所以“五四”时代的新小说,在形式上也就出现了某些过分追求“西化”的不良倾向。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时期及以后的小说创作中,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小说,如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阿Q正传》、《故乡》、《风波》,冰心的《斯人独憔悴》、《超人》,庐隐的《海滨故人》,冯沅君的《卷菴》,叶绍钧的《夜》、《倪焕之》,王统照的《号声》、《刀柄》,许地山的《命命鸟》、《春桃》,郭沫若的《牧羊哀话》、《残春》、《行路难》,茅盾的《幻灭》、《动摇》、《追求》等等。但是,当时大量的小说家,并不像上述的优秀作家那样将白话运用得那样纯熟,也不像上述的优秀作家那样对我国古代优秀的小说传统,在创作中自然地有所继承。许多青年人在“斥一切线装书为无用,为有毒”^③ 的影响下,完全不读古代作品,变成了“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只照搬西方的知识分子。因此,他们所写的小说在语言上就与中国语言习惯相脱离。这就使得当时的文学,尤其是“新兴文学的初期,生硬的直译体的西洋化的文体是流行过一时,这使读者——就是智

① 1919年2月1日《新潮》第1卷第2号。

② 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1919年2月1日《新潮》第1卷第2号。

③ 《沫若文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7~28页。

识阶级的读者——也感觉到非常的困难”。^① 还有些有过古代文学修养又到外国留学过的作者，“完全不顾口头上的中国言语的习惯，而采用许多古文文法，欧洲文的文法，日本文的文法，常常乱七八糟的夹杂着许多文言的字眼和句子，写成一种读不出来的所谓白话，即使读得出来，也是听不懂的所谓白话”^②。这些现象，都说明一些作者，既不能正确对待外国文学的经验，也不能正确对待我国古代文学的传统，二者皆失，而误入歧途。由此可见，“五四”时代的新文学运动，的确是存在明显的片面性和失误的。

正是由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所产生的这些片面性和偏差，使我国的新小说一度不能在人民群众中，尤其是文化水平较低的工农群众以及市民群众中产生较大的影响。小说的命运在当时也许比新诗要好一些，但是，它也未能走向上述的基本群众。瞿秋白与茅盾在当时都比较清楚地谈到了那时的“现状”。瞿秋白说：“五四式的新文言（所谓白话）的文学，只是替欧化的绅士换换胃口的鱼翅酒席，劳动民众是没有福气吃的。……现在，平民群众不能够了解所谓新文艺的作品，和以前的平民不能了解诗古文词一样。新式的绅士和平民之间，没有‘共同的言语’。”^③ 茅盾在《问题中的大众文艺》中说：“平心而论，几年来的革命文艺诚然很多读不出来听不懂的作品，亦何尝没有可读可听而懂的作品；然而终于跑不进大众堆里，即使勉强送了进去亦被唾弃，其中的原因早就应该引人深思熟考，不能简单把作为工具的‘文字本身’开刀了事。”^④ 他们所谈的这种情况，赵树理先生曾有过亲身的体验。1926年暑假，赵树理从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回到家乡，满腔热忱地将自己学到

① 郑伯奇：《关于文学大众化的问题》，1930年3月1日《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

② 瞿秋白（署名宋阳）：《大众文艺的问题》，1932年7月《文学月报》第1卷第2号。

③ 《大众文艺的问题》，1932年6月《文学月报》创刊号。

④ 1932年7月《文学月报》第1卷第2号。

的科学道理,民主思想向乡亲们宣传,并把鲁迅先生的《阿 Q 正传》读给乡亲们听,但农民们并不接受,也不感兴趣。农民们喜欢的还是平话艺人的谈《三国》,说《水浒》;喜欢听的仍然是古代平话中的《六月雪》、《秦雪梅吊孝》之类。茅盾在上面那篇文章中认为,新小说不能为大众接受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作家们没有能够很好地学习古代优秀小说的描写技巧。瞿、沈之间的这场讨论中,都涉及到了对古代文学某些优长的吸收和批判继承的问题。正是 30 年代这场关于“大众文艺”的讨论,显示了新文学的开创者们在理论上正视传统小说的优质与劣质,以及他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勇气。在这次讨论中鲁迅、郭沫若都就继承古代文学的优秀传统问题,自我批评了过去在这方面的片面性。鲁迅先生在《论“旧形式的采用”》中说:“‘旧形式的采用’的问题,如果平心静气的讨论起来,在现在,我想是很有意义的……这些采取,并非断片的古董的杂陈,必须溶化于新作品中,那是不必赘说的事,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决不因此就会‘类乎’牛羊的。”这些充分表现了新小说家在时代现实的要求下,向民族传统的自觉返依。新文学家在理性认识上的正确,开辟了我国的进步文学和革命文学关注现实、反映现实,大众化、通俗化的新道路。随着新文学发展的成熟,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出现了一大批具有民族特色,继承古典小说优秀传统的好作品。鲁迅的《理水》,茅盾的《子夜》、《霜叶红似二月花》,叶绍钧的《多收了三五斗》、《一篇宣言》,王统照的《山雨》,巴金的《家》,老舍的《离婚》、《骆驼祥子》、《柳家大院》、《月牙儿》,丁玲的《母亲》,张天翼的《背脊与奶子》、《团圆》,沙汀的《丁跛公》、《代理县长》等优秀的作品,不但在现代白话的运用方面显示出了比较高度的成熟,同时在继承古代小说的优良传统,小说反映社会现实,接近民众的通俗化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四十年代,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